

晴雨耕松录

日本和东亚研究交流文集

清園



赵建民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晴雨耕松录

清園



——日本和东亚研究交流文集

赵建民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晴雨耕耘录:日本和东亚研究交流文集/赵建民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ISBN 978-7-208-12085-3

I. ①晴… II. ①赵…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35461 号

封面题签 王元化

责任编辑 赵蔚华

装帧设计 张志全

晴雨耕耘录

——日本和东亚研究交流文集

赵建民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40.5 插页 2 字数 515,000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2085-3/K · 2160

定价 98.00 元

序 言

2012年初冬,我收到老友复旦大学赵建民教授的一封电子邮件,是他最近编集成的《晴雨耕耘录——日本和东亚研究交流文集》书稿,他要我审读后提些意见,并嘱我为此书撰写一篇序言。

或许因已年逾古稀,怀旧情结浓郁,与建民兄相识、相知的许许多多的情景不断地浮现在眼前:

我与建民兄初识,是在33年前的1980年初秋。那一天,年轻英俊的他从上海来到我们中国社科院世界史所,由我和同事沈永兴一起陪同去拜访我国著名的中日关系史专家汪向荣先生。汪先生早年求学于复旦大学,他当时拿出了复旦老校门的旧照片,回味昔日情景,故此他和建民兄成为忘年交的校友。当时,汪先生极为热情亲切地接待,详尽地解答了他所提的好多问题,讲述从事古代中日关系史研究的经验和教训的切身体会,并就如何开展日本史、中日关系史研究热诚地进行了指导。我们都被德高望重的汪先生的治学精神、风范和态度所深深感动。

后来,我们应王金林(时任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中国日本史学会副会长)大兄所约,到建民所在的复旦大学聚会,就编写新中国第一部《日本通史》的相关事宜进行磋商和落实,并推定由建民兄和刘予苇任主编。会前会后,我们如同亲兄弟,结下了深厚的情谊。经大家通力合作,仅用一年有半就完成了书稿的撰写和出版。主编确实付出了最大努力,从集中各位的书稿,进行悉心修改和最后定稿,与出版社联络等烦杂诸事无不尽心竭力,使该书很快于1989年8月在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并请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周谷城先生题签了书名;两年后,又由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出版了繁体字本,并多次重印,发行

于港澳台和东南亚地区。当时大家同心协力、亲密无间的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

直到如今,历经三十余载,我与建民兄能经常一起参加国际、国内的学术会议;或是在上海、北京的欢聚,或是在沈阳、哈尔滨、重庆、成都、天津等地的学术会议上,共同切磋日本史、中日关系史的相关问题;有时在学术会议期间正好同住一室竟会彻夜不眠、畅谈到天明。这正是“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之情,随着时间的推移,非但没有淡漠,反而日益深厚。如今,还一直常有电话、电子邮件往来。因我长期在《世界历史》、《中日关系史研究》编辑部工作,加上我们 33 年来结下的手足情谊,他对我又如此的信任,这写序言之事便不可能再推辞了。

初读建民兄的书稿目录,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其按“问题意识”立出的 7 个研究专题(中日文化差异因果择释、中日两国摄取欧洲近代文化之比较、兰学:日本近代化的胚胎、传日儒学的逆输出、教育交流求变革、战争胜负察损益、东亚视域观日本)所选的 36 篇论文。再一篇篇看这些论文的题目,就能十分清楚地明了他学术研究的起步;熟悉他所关注的重点在于日本文化和中日文化关系的研究。如书稿中的《论〈日本外史〉的撰刻和在中国的流传》、《森有礼的〈日本教育〉在中国的翻译及其影响》、《大阪兰学的始祖:桥本宗吉的生平和业绩》、《江户时代杰出的町人学者:山片蟠桃》、《志筑忠雄的〈历象新书〉翻译与儒学自然观》、《西博尔德的日本研究及其国际影响》,以及《17—19 世纪初东亚地区的文化交流——朝鲜通信使访日与朝日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关注》,等等。细读这些论文,则不能不承认:这些论文,都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均为国内日本史学界研究的“第一篇”,弥补了学术研究的空缺,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观点;这些成果确有很好的学术影响和社会效益;故其创新、开拓之功,确不可没。

又如第二个研究专题“中日两国摄取欧洲近代文化之比较”的 4 篇论文,既有中国和日本吸收欧洲文化方面的比较,又有更为全面、综合的对

两国近代化的比较,还紧紧地围绕与欧洲近代文化的密切关系展开论述。这些论文,不仅有学术分量,而且有超越中日两国的东亚、东西方的视野,更能体现出其总结经验教训和寻求历史启示的参考价值。而这正是建民兄“做学问”的学术追求和明确的治学原则。所有这些跟他在历次学术会议上的报告、发言中所强调和提倡的:我国的日本史研究,必须重视江户时代史研究、加强日本文化研究、注重中日欧的比较研究,并把日本置于东亚乃至世界视域中考察等的主张、观点是一脉相承的。建民兄的可贵之处更在于,对这些原则、观点,自己不仅是力倡,而且是身先士卒,是身体力行的。

日本史研究跟研究日本现实问题是既有联系又相区别的,犹如他在《自序——在日本和东亚的研究交流征程中求索》所作的形象比喻:研究历史是色香味俱佳的“满汉全席”;而现实问题研究则是为解决眼前果腹的“快餐”。历史研究不仅要弄清历史真相,还要为解决现实中的问题提供准确而行之有效的启迪和思考。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历史认识问题”一直是中日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中的一道“坎”、一个“结”,他秉持“历史研究要与现实相联系”的精神,为评论日本社会右倾化、批判日本右翼势力否认侵略战争及其暴行的谬论,多年来撰写过《“大东亚共荣圈”的历史与现实思考》、《评析甲午战后日本对台湾的“一体性规划”》、《略论“南京大屠杀”中的图书劫掠》、《占港日军劫掠冯平山图书馆之始末》等,这些论文富有针对性和现实感,这对于我们如何寻找和确定历史研究的课题也不无启发。

通观建民兄的书稿,大致可以看出他的学术研究思路和方法。除了学术研究与教学相结合、历史研究与现实相联系以外,他通过纵向考察、横向探索,注重在宏观视野下的实证和比较,即在大视野下注重微观的考释和实证,从而形成了极具个性化的研究格局和特色。尤其可贵的是,他始终强调和践行的学术研究要重在创新:即理论创新、观点创新、方法创

新、挖掘资料创新。如他前不久在依据原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撰《一幅近世近代中日交流的文化地图——从〈日本外史〉〈日本教育〉中窥探跨文化传释》一文(刊于《东北亚学刊》2013年第1期),成为本文集的压轴篇。作为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的“新视域”,它对于这个既老又新的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的课题,无疑是一种新的延伸和拓展。确实,学术研究只有坚持创新才能具有永恒的生命力。

建民兄是一个艰难躬耕、淡泊名利的纯粹学者。他对学术研究的忠诚、坚守、执着也深深地感动了我。仔细拜读他的“自序”,对我来说,既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又是一次美好的学术享受,更是一次对我们这一代学人成长心路历程的回顾和总结。我一遍遍地读着,也一次次地深感震撼。

再读《文集》中的“访日感怀与书评”的9篇文章和“日本和东亚研究的回顾与前瞻”的8篇文章,以及“附录”、“后记”,我除了赞赏更是敬佩!

在这里,我还想对他的“做人”再多讲几句。他除了从事自己的课题研究,还关心着相关学术社团的建设。早在1988年5月,他就发起筹建“上海中日关系史研究会”(现改称“上海市历史学会中日关系史专业委员会”),特别令我感动的是,他在没有经费来源和人力不足的情况下,竟能竭尽个人之力和获大学同窗之助,非常成功地举办了两次颇具规模(中日学者均多达五六十人与会)的重要国际学术研讨会,这两次会议均在日本有着很好的反响。2003年,他被上海市社会科学联合会评为“优秀学会工作者”当然是情理之中的事。作为一位学者,能如此关心、献身公共事业和对学术社团活动的奉献精神真值得崇敬和效法。他对中国日本史学会、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两个全国性学术团体也如同对上海中日关系史研究会一样倾力支持,对一些关键性活动出力不少。

建民兄在“自序”中,动情地记述了他与前辈大家、同辈师友的交往,感人至深。就如每次与他会面,都是一次欢快的享受,他的乐观、豁达,积极进取的风采总能感染众人。他待人热忱和亲近,我们都亲昵地把他称

作“大家的开心果”。尤其是建民兄对待大病的精神令人敬佩！2003年5月，当我得知他患病和手术的消息后，心情很沉重、非常不安。可当后来见到他时“海棠依旧”：这十年来，他参加了多少次国内、国际会议，又出了多少成果啊！前述今年第一期《东北亚学刊》所刊论文和编好这部《文集》，就可以看出他所付出的心力和劳苦，而看不到的是，他那锲而不舍、驰而不息的拼搏进取精神。凡此种种我很有感慨：此生能有建民兄为知己，足矣！

最后，还想引用他在自序中的一段话，来结束我的序言，并诚望能与各位师友、同仁和读者诸君共勉：“品格与情怀是治学的思想根基。作为学者要有忧乐情怀，不应追求时尚而趋新，不该失去原则而媚新，定要有科学的求实精神和创新意识，为面对现实从事认真的学术研究，不断开辟学术研究的新园地。”

衷心祝愿建民兄健康快乐，延年益寿，继续发挥余热，勇攀新高！

谨为序。

汤重南 2013年2月28日

于北京 清友园

汤重南：1940年生，1964年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工作。现为该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日本史学会名誉会长、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顾问、中日历史共同研究委员会中方委员，《世界历史》编委、《中日关系史研究》主编。

自序

在日本和东亚的研究交流征程中求索

一衣带水、一苇可航的近邻日本,是个孤悬海中的岛国。日本民族具有文雅与野性并存的特点,因善于模仿、勇于创造,成功地进行了明治维新,致使日本成为亚洲最早的现代化国家。日本民族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既谱写了奇迹和辉煌,也留给人们深刻反思的空间。我们若展现日本及其民族与中国既亲近又隔阂的历史画卷,则有助于对日本更全面深刻的了解,它现代化成功的经验教训也可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某些有益的启迪;当前中日关系中的摩擦和冲突似乎都可从以往的历史中找到缘由。准确地认识历史和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是一把解读现实问题的钥匙。因此,中国学者研究日本历史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一、中国人的日本研究史概观

中国人重视和研究日本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历史文献中最早记载日本的似是成书于战国和西汉初期的《山海经》,其《海内北经》第十二记云:“盖国在距燕之南,倭北,倭属燕。”此处的“倭”是否就是日本,迄今尚无定说。然而,在中国的官撰史籍,即正史中提到日本的要首推《汉书·地理志》的《燕地》项下有关“倭”的记事:“夫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仅这 19 个字,记述了中国与日本的通交关系。当时因倭使“献见”未到达我首都,故只是附带提一笔而未列专传。然而,在中国正史中共有 16 部正史的 17 篇有关日本的列传,其中公元 289 年陈寿著《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倭人条》(通称《魏志·倭人传》),

是中国正史中较详记述日本的第一篇，它总共 1 987 个字，既记述了公元 3 世纪前后日本列岛上的一切情况，又记叙了日本与中国的通交关系，成为中国典籍中最早并详尽地记述日本列岛上一切事情的文字，其史料价值极高，为当今日本学者研究日本古代史最原始的文献资料。此后，中国正史中均有对日本立传的记叙，反映出中国历代统治者对日本认识的变化和进步。

为何中国的 16 部正史中却有 17 篇有关日本的列传？这缘于《旧唐书》中，把贞观二十二年（公元 648 年）前的事，记在“倭国传”中，而从武周长安三年（公元 703 年）起发生的事，就不再记入“倭国传”而归到了“日本国传”中，故出现在《旧唐书》中有“倭国”、“日本国”两传并列。据中日史学界依中日朝三国史书记载所考定的日本国号，启始于公元 701 年。这已被 2004 年 10 月，在西安发现的唐代日本留学生井真成（公元 734 年卒）墓碑所证实，其墓志文记“公，姓井，字真成，国号日本”。这是首次发现使用“国号日本”的实物，也足证《旧唐书》记述之准确。

中国人重视和研究日本，往往跟当时的现实很有关系。迄今为止，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四次研究日本的高潮就足以证明。开启中国人研究日本之端绪的，是在明朝嘉靖年间（1522—1566），当时倭寇大骚乱频发。日本大名细川、大内二氏之间为争夺朝贡垄断权，故在 1523 年（嘉靖二年）发生“宁波争贡事件”之后，倭寇侵犯愈深。为使中国军民了解日本、防患倭寇，故有薛俊编撰的《日本考略》刊印，其有独创的“寄语”（用汉字注日语发音）为日后同类著作所袭用。继之，有郑若曾所编《日本图纂》、《筹海图编》以及郑舜功的《日本一鉴》。这些图书大多是根据旧史记载所作的重新分类编排，唯有郑舜功《日本一鉴》，是他在 1556 年受命赴日的 6 个月间，“咨其风俗，询其地位、得闻其说、得览其书”的实地考察，他是当时第一个亲自踏访日本而成书者，故该书有可信度和较高史料价值。有关上述诸书，均可参阅汪向荣所著《中日关系史文献论考》（岳麓书社出版，

1985 年)的详释。

进入清朝,由明末传入中国的日本史书《吾妻镜》,时被誉为“海外奇书”,备受中国人关注,即由书法家、画家、诗人翁广平据此编撰了《吾妻镜补》(别名《日本国志》,1814 年),成为清代中国人研究锁国时代日本的代表作。此后,由于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引起中国人的极度关注,加上中国严峻的危机感,促使中国有识之士的思考和反省而注意对日本历史和现状的研究,形成中国历史上研究日本的第二次高潮。黄遵宪的《日本国志》(1887 年成书、1895 年刊行),以史志为体例,涉及领域极广且叙述系统全面,其中对明治维新的革新措施论述尤详;康有为的《日本变政考》系编年体的明治维新史,成为光绪皇帝“百日维新的教科书”;1902 年刊行的王先谦著《日本源流考》,系统记述日本历史和明治维新。这些著作的刊行,表明中国人对日本进行独立研究的专门领域开始起步。

到了民国初期,对日本的研究领域有所扩大,水平也有明显提高,如戴季陶的《日本论》(1928 年出版)至今仍被认为是研究日本的名著(佐伯彰一、芳贺徹:《外国人による日本論の名著》,中公新书,昭和六十二年三月)。随着日本对华侵略的日趋扩大,激起中国人民的抗日运动,中国的日本史研究再度掀起高潮,从过去客观介绍日本、赞扬明治维新和近代改革的研究,逐渐转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研究,并对其进行揭露和批判。如傅天退的《日本法西斯主义》(1933 年)、郑学稼的《日本的军部、财阀、政党》(1937 年)、林垌平的《近卫体制批判》(1940 年)、江肇基的《日本帝国主义的毁灭》(1945 年)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著名历史学家,被誉称为“新中国日本史研究三大元老”的吴廷璆、周一良、邹有恒诸教授所发表研究日本的论文,引领中国的日本史研究,起到了奠基作用。中国的改革开放,掀起了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成果丰硕,通史、断代史、专题史、辞典等门类齐全的第四次对日研究高潮。这是我们这一代人亲临其境的。

中日关系史是中国学者研究日本史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其研究进程大体跟中国学者研究日本史的四次高潮相吻合,而且两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王芸生编著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胡锡年译木宫泰彦的《日中文化交流史》是颇有影响的著译著作。

为了解和把握中国学者的日本史研究、中日关系史研究的历史进程及其各自特点,可参阅武安隆、熊达云的《中国人の日本研究史》(日本六兴出版,1989年),李玉、汤重南等主编的《中国的日本史研究》、《中国的中日关系史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及最近由李玉主编的《新中国日本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年)等书,它们均全面详尽地揭示论著目录和介绍了相关研究的成果和观点。

二、忝列日本史研究行列的机缘

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的日本史研究掀起了前所未有的、成果最为丰硕的研究高潮,我也有幸能忝列日本史研究队伍之中成为其中的一员。这也许跟自己的出生环境和成长经历,即在日本发动侵华的战难中诞生,在中日对立时期成长,在中日友好中趋向成熟有着密切关系。1938年1月5日,我出生于上海宝山罗泾镇(靠近长江边,时称“小川沙”)。出生前后,正是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后沿途杀向南京,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之时。而我的家乡就是日本发动八一三淞沪战争时最早的登陆地。登陆日军疯狂地烧杀抢掠,烧毁房屋上万间,屠杀乡民2000余人,妇女人心慌乱,无处藏身。我就是在这战火纷飞、乡亲们四处逃散的战难中呱呱落地,在日军的屠刀下度过婴幼儿生活。因此,在我最早的记忆中,有着日本鬼子的凶恶形象。

从小学到初中期间,我的脑海里一直有个疑问,为什么日本要侵略中国?所以在中小学求学时对历史课程产生了兴趣。1954年初中毕业后



1980年9月,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任鸿章教授(二排右四)主持
“日本古代史讲习班”,由日本专修大学久保哲三(二排右五)教授主讲

做了几年小学教师等工作。1959年考取了复旦大学历史系。在大学五年求学期间,破例选修了第二外语(日语)。毕业留校后在刚建立的国际政治系任教。“文革”十年间,坚持阅读日文版《毛泽东选集》和旧刊《北京周报(日文版)》。1979年转回历史系任教。次年9月参加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举办的“日本古代史讲习班”,后赴大连出席“东北地区中日关系史研究会第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会”,始与国内日本史研究者相识,如与“中国‘南京大屠杀’研究第一人”高兴祖教授同住一室,他赠我《侵华日军暴行——南京大屠杀》(非正式出版物)一书;认识了来自日本关西大学的大庭脩教授等一批日本学者。这可谓是我日本史、中日关系史研究的真正起点。

1979年2月在历史系执教后,承担了近20年的“世界中世纪史”基础

课程的教学,这为日本古代中世纪史的教学和研究拓宽了视野、打好了基础。在讲授“世界中世纪史”课程的同时,开设了“中日文化交流”全校公共选修课,文理科学学生选修的不少,尤其令我感动的是,有一位南开大学的博士研究生来我校国际政治系访学,其间他从头至尾听完了我的授课,最后还交了一份很有质量的有关日本遣唐使研究的读书报告。

1991年系里分配我担任“世界中世纪史”、“日本史”两个研究方向的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因我感到既不通英语又未去过日本,决不能误人子弟而未如期招生。次年去了日本访问,故从1993年起招收日本史研究方向的研究生。经过几年的努力,先后开出“中日文化关系史”、“中日文化交流史专题研究”、“日本史”、“日本古代中近世史”、“日本史文献导读”、“日本史研究理论与方法”6门有关日本史的本科生、研究生课程,组织“从浙东佛迹看中日文化交流”(舟山、宁波、天台、新昌、绍兴、杭州)的教学考察;组织赖山阳的《日本外史》、石田一良的《文化史学:理论与方法》的读书会;组织“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课堂讨论等,逐步形成富有个性化的教学体系。

早在1983年夏,中国日本史学会在江西庐山召开“日本史教学经验交流会”。与会者普遍感到,当前日本史教学苦于没有一本适合的教材。在国内“北强南弱”的日本史教学状况下,我提出了一个建议:组织力量编写一本适合南方高校“日本史”课程的教材。该建议为与会者所赞同,随即着手组织编写成员、分头撰出编写大纲,但因故搁浅。直到1986年冬,在北京劲松召开的“中日文化交流史学术讨论会”上,我重提编写《日本通史》一事,得到王金林、汤重南二位好友的鼎力支持,随即尽速启动,由复旦大学教务处主持,召开“日本史教学教材研究会议”,讨论日本史教学现状、教材编写的指导思想、体例、大纲,最终确定章、节、目的标题,并推定由我和刘予苇担任共同主编,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完成编写和出版任务。这就是1989年8月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日本通史》;1991年8月在台

湾出版了繁体字本。

作为中国学者研究日本史,在思想上要有个明确的认识:我们研究日本史,目的在于以日本为参照,从中国的现实来寻找研究日本的课题,为推进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日关系的持久健康发展服务。要认识中国就要研究日本;反之,研究日本也要好好地研究中国。因此,在研究日本史的相关课题时也要以中国为参照,并对两者进行比较,充分体现出中国学者研究日本史的特色、风格和气派。同时,中国学者的日本史研究与中国学者研究日本现实问题,两者既有联系又相区别,这可譬喻为:研究日本现实问题是为解决眼前果腹的“快餐”,而研究日本历史则是一席色香味俱佳的“满汉全席”。研究历史要搞清楚历史事实的真相,力求原原本本地还历史的真实面貌;历史研究就是要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准确而又行之有效的参考,也即通过客观、准确地叙述历史真实,从历史事实的分析和归纳中获得启发,让“历史”在现实中发挥作用,以体现历史研究的学术价值和生命力。

我的日本史研究是跟我承担的“世界中世纪史”、“中日文化交流”的课程教学紧密相联的,注重在中西封建城市的比较、中日礼仪方面的异同及其原因的分析。1982年9月,中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会在昆明举行学术研讨会。我在会上发表了《试论中国与西欧的封建城市问题——探索中西封建社会发展缓速的原因》(《云南社会科学》1982年第12期),《世界史研究动态》(1983年第5期)、《光明日报》(1983年6月1日)刊有该文的摘登。1991年5月,中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会在贵阳举行“全国首届比较史学研讨会”,会上我作了“从中日两国吸收欧洲文化看两国社会发展差异的原因”的发言,提出“转变观念也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观点,这在当时的形势下是有一定风险的。在会议期间参与筹建“中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会比较史学分会”(庞卓恒为会长,孟广林为秘书长,我为副会长);还应贵州大学历史系林振草主任邀请,作了“中国传统文化与日本的现代化”学术

讲演《贵州日报》(6月17日)设栏“比较史学·传统文化·现代化”,作过多位学者的访谈报道)。1994年8月,中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会在北戴河举行第七次学术研讨会,我发表了《中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从西欧向东亚移动——应当重视东亚地区史的共同研究》一文,倡议并获准成立“中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会东亚研究中心”,被推为该中心主任。

三、研究路径:以“问题意识”立课题

我的日本史研究秉持站在中国人的立场,把中国作参照并结合中国的现实来探寻日本史的研究课题。事先没有设计过一个总体方案而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波浪式螺旋形地进行的。依据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的理念,秉持做一个课题研究应该观点有新意、史料有新的挖掘,要有清晰的“问题意识”。故将以往所作过的研究,从中归纳起来大致有如下七个专题。从总体看来,也许比较宽泛而深度尚嫌不足。

1. 中日文化差异因果择释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中国学者研究日本时有的往往用“同文同种”来表述中日文化的关系,也有个别日本学者公然宣称中日文化系“异文异种”。无论“同文同种”还是“异文异种”的观点,除其目的有善意或另有意图外,依据历史事实作分析似均不准确。窃以为:“中日两国既不同文也不同种,但不同中有同、同中有不同,似属‘同性异质’的文化。”故在认识和处理现实的中日关系中,我们不仅要发挥“同”方面的作用,更主要的是要寻找“异”的方面,唯有这样才能加深相互认识和理解。因此,关于中日文化差异及其因果问题值得作深入的研究,这是中日历史发展中同途异归的一个重要原因。

2. 中日两国吸收欧洲近代文化之比较

中日两国的历史发展特别是近代以来分道扬镳,各自走上“近代化”

成功和失败的道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日两国对待吸收欧洲文化的认识、态度和方法上的不同。这个差异致使两国近代以来所走的路径和效果大相径庭。其中有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即日本开始吸收欧洲文化时借助中国的“汉译西书”,且从中国的实情(如上海与西方的交往)中受到启发。这就是说,中国对日本吸取欧洲文化能起到帮助和引导作用,而其自身为何在吸取欧洲文化时却未获成功?因此,对中日两国的吸收欧洲近代文化试作比较,则是中国学者研究日本史的优势所在和理所当然地应作探讨的重要课题。我对此先后作过“宏观考察”、“微观实证研究”,经过纵向的考察和横向的探索,从而使自己初步奠定“在宏观视野下的实证和比较”的研究思路和方法。

3. 兰学:日本近代化的胚胎

一般认为,日本的近代化始于明治维新。其实,早在江户时代就有了奠定近代化的基础。这就是日本在既有实验科学发展和儒学兴盛的基础上,接受西方传入的学问。16世纪50年代经葡萄牙传入的“南蛮学”,尚属宗教文化;18世纪20年代起以荷兰语为媒介,传日的西方自然科学等称“兰学”;明治维新前后传入以英、法、德语为媒介的政治、军事、经济为主的社会科学称“洋学”。洋学也可作传入日本西方文化的总称,而兰学则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和阶段,似“滴油入水布满全池”。它是在日本已有的实验科学,“把西洋的科学文化嫁接于儒学文化,开出的鲜艳之花”,确是日本近代化的胚胎。因此,研究兰学在日本的传播,是弄清日本近代化源流的基本课题之一。

4. 传日儒学逆输出

中国传统文化之一的儒学,公元5世纪初始传入日本。儒学对于日本的影响成为不少中国学者研究的热点之一。儒学在日本的传播在江户时代(1603—1867)中期达到鼎盛,那时的日本人中大概有70%的人能阅读汉文。由中国传入的儒学,经日本的体系化、社会化,成为与中国儒学